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初创

聂荣臻

首战平型关

9月中旬(1937年编者),日本侵略军分兵三路在华北展开全面进攻。一路以半个师团的兵力沿津蒲路向南进犯;第二路以一个师团的兵力沿平汉路向南进犯;第三路以三个师团的兵力沿平绥路东段、同蒲路北段向南进犯。第三路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又分为左右两翼:右翼一个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占领大同后,准备出山阴进犯雁门关;左翼第五师团集结怀来、宣化,分两路西进,一路往蔚县、广灵前进,一路往怀来、阳原向浑源进击,企图突破平型关与大同之敌会师雁门关。这两路日军总的企图是,由晋北打开通路,攻占太原,以大迂回的动作,迫使国民党的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五省的目的。阎锡山感到日军此举威胁到山西的腹心地区,侵犯了他的根本利益,因此多次要求我军尽快向灵丘方向开

进，配合他阻滞日军的攻势。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军紧急开赴晋东北前线。

我们在原平没有停留多长时间，因为前边的情况很紧急。国民党军队那种不战而退的恐慌情绪，实在使我担心，说不定，他们很快就会从晋东北全部败退下来。何况林彪已经到前边看地形去了，我必须赶紧带着部队开上去。

我率师司令部 and 三四四旅绕向五台山的山间小路前进，没走代县、繁峙比较顺的那条大路。因为那条路上国民党败退的军队一帮接着一帮，堵塞着道路。我还担心他们大量散布的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到部队的士气。为了摆脱这些溃兵对部队情绪的影响，因此，我决定避开他们。

祖国的大好河山即将沦入敌手，一路所见，令人心寒。群众情绪惶恐，村庄冷冷清清，想从村里找一个向导，或是找人打听前边的情况，都非常困难。

我们先经过五台，又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龙泉关，从阜平北面的丁家庄插到了平型关东南的上寨镇。

我记得，到达上寨的时间是 9 月 23 日。在这里，我同林彪会合了。这时，灵丘城已经失守，国民党军队的一帮溃兵跑到上寨砸老百姓的店铺，被我们的战士轰跑了。我见到林彪以后，告诉他部队都带上来，问他前边的情况怎么样？他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他摊开地图，同几位参谋一起，把平型关周围的地形和初步的作战设想介绍了一下，问我的看法。我表示，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我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考虑怎样打得好，这是我们同日本侵略军第一次交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在平型关打一个大仗的计划，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这样

的作战计划，前线指挥员有权根据情况决定。好打就打，只要事后报告一下就行了。事实上，事先请示也不可能，军委和总部不十分清楚前线的具体情况，敌军怎么样？地形怎么样？特别是进行游击战争，上午打了，下午就有可能离开，事事请示，就会贻误战机。至于同阎锡山第二战区方面的关系，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八路军进入山西以后，部队的行动和作战，用不着直接和阎锡山打招呼，他有什么想法，可以在太原同恩来同志讲或是通过八路军总部转达。

为了打好平型关这一仗，我们在上寨召集全师干部举行动员会议，说明当时情况，我们有利的条件和作战应该注意之点。

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敌板垣第五师团。板垣本人在中国呆了很久，他的全名叫板垣征四郎，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他早在 1929 年就在关东军任参谋，当时是大佐军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洲国，就是由他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由于组织傀儡政府有功，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他已升任中将师团长了。板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面有些名气。板垣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的路线，因为他清楚这里是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地方，是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他自带队进攻华北以来，遇到的都是不战而退的国民党军队，气焰骄纵得很。他有个错误的估计，以为我军不可能这样快东渡黄河，根本没有估计到在他眼皮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对于敌军的这些情况，当时我们还不甚清楚，敌军的番号和进攻意图，是平型关战斗之后，从缴获的战利品和作战地图上了解到的。在干部会上，我简要地介绍了日军由灵丘西进的情况。同志们情绪非常热烈，摩拳擦掌，准备打一个大胜仗。我军的战斗部署是：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与涞源之间和灵丘与广灵之间，截断敌人交通线，阻止敌人增援；以三四三旅两个团为主攻，三四四旅一个团到平型关北面断敌退路，一个团作师的预备队。攻击部队全

部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准备给敌以猛烈打击。林彪讲完兵力部署后，我在讲话中强调了为什么要打这一仗，为什么必须打好这一仗，并向各级党的组织提出了要求。会议一结束，师的主力就连夜赶往距平型关三十余里的冉庄待命。

我抓紧这个空隙，到前边察看了这一带的地形。平型关确实是一个伏击敌人的理想地域。从平型关山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十多里，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而南北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我们的部队正好埋伏于此。

24日，在断断续续的炮声中，前沿部队报告，敌人有于翌日大举进攻的可能。傍晚，师部又收到了阎锡山部队送来的一份“出击计划”，说他们担任正面防御和堵截。我和林彪在马灯下，摊开军用地图，把各方汇集的情况，又作了一番详细的研究，随后用电话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三四三旅本晚二十四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阵地，三四四旅随后开进。

白崖台一线。距敌预计经过的汽车路仅二三里地。那天夜里，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干部战士们既无雨衣，又缺御寒的服装，只得任凭秋雨湿透征衣，沿着崎岖的山沟向前行进。最糟糕的是山洪爆发了，湍急的山洪咆哮着，盖住了哗哗的雨声。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拉手结成“缆索”，或者拽着马尾巴从激流中淌过去。师里虽然有工兵营，也能架桥，但是水势凶猛，大雨滂沱，短期内难于成功。徐海东同志的三四四旅走在后边，闯过去了一个多团，另一部分被越来越险恶的山洪拦住了。我看到有的战士急于过去被洪水冲走了，就同林彪商量，这个旅过来的一部分作预备队，没有过来的不再强渡，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林彪同意了这个意见。所以，平型关伏击只使用了由杨得志、陈正湘同志率领的六八五团和由李天佑、杨勇同志率领的六八六团。

独立团和骑兵营已于 23 日分别向平型关东北和以东开进。24 日，独立团在灵丘与涑源之间的腰站，同日军打了一遭遇战，毙敌 300 余名。

经过大半宿行军，我们赶到了目的地，雨停了，天也亮了。按照预定计划，将大部兵力布置在由平型关到东河南镇约十多里长的沟道通路的东南山地上，同时派出了一支部队迅速由南向北以隐蔽动作穿过沟道通路，占领了东河南镇以北的一个高地，以便切断敌人的后路，造成两面夹攻的阵势。我们的师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站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纵观全沟。不知哪位有心的同志，当时给师指挥所拍了一张照片，从那张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和林彪的指挥位置。部队部署完毕，我举起望远镜朝师指挥所前侧的山头望去，看到部队隐蔽得非常好，经过一夜风雨侵袭的战士们，正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战斗。

这时，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已隐约可见。这是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的辎重和后卫部队，共 4000 多人。前面是 100 余辆汽车，接着是 200 多辆大车，除军用物资以外，车上坐满了戴着钢盔的日本兵，再后面是驮着九二式步兵炮的骡马和骑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充斥在山沟间。敌人那种骄横的阵势，得意洋洋的样子，真使我们难以忍受。他们没有什么防备，因为他们南下以来，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虽是辎重和后卫部队，仍然大摇大摆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

伏击部队的报告同时汇集到师部：敌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这时，我们下达了攻击命令。我看了看表，记下了当时的时间，是清晨 7 时整。

战斗一开始，全线部队即居高临下地向敌军展开猛烈袭击，一下子把它的指挥系统打乱了。山沟里，汽车撞汽车，人挤人，

异常混乱。我同林彪研究了一下，决定把敌军切成几面，分段吃掉它，随即下达了命令。

立刻，巨大的冲杀声响彻山谷，战士们勇猛地向公路冲击，同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肉搏战。侵华战争初期的日军与后期的不同，他们经过严格的军国主义训练，抵抗得十分顽强，虽然失去了指挥，仍分散着跟我们厮杀。有的趴在车轮下和沟坎上射击，有的向坡上爬，妄图夺取阵地。战斗始终打得很激烈，甚至出现了敌军的伤兵与我们的伤兵打成一团的情况，互相用牙齿咬，用拳头打。敌人虽然很顽强，但它无法抵住我军的猛烈进攻，不能摆脱失败的命运，一部分被歼了，一部分向东跑池逃跑了。

到中午，战斗临近结束之前，我随同出击部队下到沟底的公路。这次伏击战的战果，可以说是很壮观的。公路上，敌军人仰马翻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堵满沟底。我在察看战果的时候，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躺在山洞里面向战士们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我说丢手榴弹，消灭他！这时，我们的战士还把日本侵略军当成内战时期的敌人，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满脑袋装的都是怎样占领中国，所以即使剩下一个人，也很顽强。

当我们完全控制了这条山沟，马上按预定计划，命令一部分部队向东跑池一带的日军进攻。这里原定是阎锡山部队阻击的目标。当我们在十里长沟与日军激战的时候，他们一直没按预定的作战计划动。敌人经东跑池突围的企图已经非常明显了，他们仍按兵不动。这样，东跑池的敌军未能全歼，黄昏时，突破阎锡山部队的团城口阵地向北逃窜。

平型关战斗，我军歼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 1000 余人，毁汽车 100 余辆，大车 200 多辆，缴获九二式步炮 1 门，炮弹 2000 多发，机枪 20 多挺，步枪千余支，战马 50 余匹，其他武器辎重甚

多。还缴获了一批日军作战用的地图和文书。听到我军打了大胜仗的消息，附近山沟里的老百姓，都自动出来帮我们搬战利品。

平型关大战获得重大胜利的消息，立时传遍全国。全国各界人士给我党我军发来了大量贺电、贺信，甚至连蒋介石也来电表示祝贺。这一胜利，确实使全国人心大振。

平型关大战后，不少爱国人士曾经议论过这样一个问题：久驻华北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尚不能打一个小胜仗，为什么刚到前线，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的八路军，却能一举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从根本上讲，这是由于我们党坚决抗日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八路军东渡黄河以来，官兵士气高涨。战前，同志们就憋足了劲，决心严惩侵略者；战斗中，战士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六八六团副团长杨勇同志在战斗中负了伤，仍继续指挥部队作战。连长曾贤生同志带领战士们上好刺刀冲下公路时，高喊着：“我们要用刺刀消灭敌人，就是牺牲也要堵住敌人！”他首先冲进敌群，在肉搏中光荣献身。担负穿插堵击任务的一个连队，打得非常顽强，战斗结束时，全连干部除一人以外，全部负伤，三个排长英勇牺牲。干部战士们英勇无比的精神，是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另外，从指挥上讲，我们选择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两面夹攻，在狭窄的山谷给敌人突然袭击，使它的装备优势无法发挥。从敌军方面说，它长驱直入华北，异常骄纵轻敌，也导致它的这次惨败。

平型关大捷，是我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这一胜利，首先在于它的政治意义。在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的混乱战局下，平型关大捷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确有战胜任何敌人的勇气和力量，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希望之所在。对于这个胜利，我再引用一位著名爱国志士写的一段文字来说明它的影响。国民党老同盟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曾

经著文写道：

“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

续范亭先生的评价，代表了当时全国人民对这次胜利的看法。除此之外饱受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溃兵祸害的华北人民，从平型关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可以信赖的。这为后来我们在这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我们出师以后，第一仗就是平型关战斗，它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树立了八路军的威信，对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尤其是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候，这一胜利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这是平型关战斗胜利最重要的意义。

五 台 分 兵

平型关大战之后，一一五师转回到五台。八路军总部也来到五台，总部驻在五台山下的南茹村。我们的师部设在五台城东的一个小村子里，准备在这里略事休整。

在五台，我看到了毛泽东同志发来的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几个电报。在八路军出师华北之后，毛泽东同志就这个问题连续发了一系列电报。有的是单独发给八路军总部领导同志的，有的是同时发给八路军各师和北方局负责同志的。有些电报，我们在北进的路上就传阅过，有的是从平型关下来才看到

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些电报中，再三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一基本的战略方针。因为，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他认为，当前红军的拿手好戏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他说，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种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因此，就要分散兵力，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他指出，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能决定性地战胜敌人，援助友军。他又指出，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的游击战争，而重点在五台山脉。整个华北工作，应该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都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河北党应全力发展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势，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以备在敌人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

看到毛泽东同志这些电报后不久，就接到党中央决定我留在五台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命令。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

平型关战斗结束之后，八路军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行动，就是侧击南下忻口和太原的日军。

忻口会战，是 10 月中旬开始的，由卫立煌的部队在那里抵挡了一阵。平型关的胜利，使日军不敢贸然前进，也使恐敌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得到收容的机会，这才有了忻口会战的可能。忻口那个地方，国民党军队大概有两个多军的兵力，总的归卫立煌指挥。

那个时候，五台这边的电话线与忻口、太原的电话线连在一起。在不意之中，我还和卫立煌通了电话。说起来怪有趣的，卫立煌本来同国民党前线某将领通话，可能电话接得不好，竟要我到这里。我拿起电话来，听了听，是卫立煌在要某将领，就放下了。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卫立煌要的。我问他那边情况怎样，他说，很紧急！正找某将领。他也问了我们这边的情况，我简单地说了。不一会，就听到某将领在那里讲，不行啊！伤亡很重，快没人啦，枪支弹药也供不上。卫立煌说，你身上不是还有一支枪吗！枪不够，我身上还有一支！忻口的抵抗，卫立煌的态度比较坚决，某将领有些动摇，不管怎么样，总算在那里抵挡了一阵。

八路军为了配合忻口会战，同时派出了几支部队，深入日军侧后袭击敌人。

忻口会战最紧张的时候，一二九师陈锡联同志任团长的七六九团，在山西代县看到日军的飞机从早到晚飞来飞去，轰炸国民党军队的阵地。经侦察，在阳明堡发现了敌人的飞机场，就在夜间派出一个营的兵力进行夜袭，把敌人的 24 架飞机全部摧毁了。火烧阳明堡飞机场的消息报告八路军总部后，总部转告了第二战区。开始，他们还不相信，觉得八路军武器那样差，还能毁掉日军那么多飞机？但是，第二天飞机没去轰炸，第三天也没去，由太原方面派出的侦察机证实日军飞机确实被烧光了，他们这才相信。

一一五师这边，独立团和骑兵营积极活动于涞源、灵丘、广灵、蔚县、易县、浑源、阳原和阜平、曲阳、行唐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

还是我们进行平型关战斗的时候，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就率政治部机关，翻过山西和河北交界的长城岭，东进阜平县城，到冀西山区发动和组织群众。当时，国民党部队朱怀冰

的一个师还驻在阜平城东的王快镇。平型关战斗结束之后，北方局派王平同志赴阜平山区组织人民武装。10月中旬，平汉线上的日军侵占了石家庄，朱怀冰连夜逃往山西。一一五师骑兵营打开了曲阳城，打垮了进占曲阳的日军一个中队，捣毁日军在曲阳建立的兵站。敌军原计划跟着朱怀冰撤退的道路，开辟阜平、龙泉关、五台这条路，直插太原。我们把它的兵站搞掉了，它看到这条路不安全，又不能走汽车，就放弃了这一企图。这样，从五台到阜平一线，就由我们控制了起来。罗荣桓同志后来对我说，敌人兵站所存的物资，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没有粮食吃，就从捣毁的兵站里拣饼干和罐头，那些东西制作得很好，饼干很脆，一点也不潮，袋子里还装着小糖块，罐头密封得很严实，保存多年也不易变质。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侵华战争，是作了长期周密准备的。

配合友军作战，侧击南下的日本侵略军，还包括一二〇师开辟雁北的游击战争，一二〇师和一一五师驰援娘子关的行动。有力地迟滞了日军的前进，才使得同蒲路北段的国民党军队，得到安全撤退。

10月26日，正太路要隘娘子关失守，山西抗战形势急转直下。11月2日忻口失守，11月8日太原失守。中央指出，至此，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转入主导地位，在新的形势下，华北我军分为四大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一一五师主力由晋东南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地区；一二〇师开辟晋西北地区；一二九师开辟晋东南地区；我率一一五师一部开辟五台山周围的晋东北地区。一一五师从此就分开活动了。

其实，从10月下旬驰援娘子关开始，一一五师就分为两部分了。“分家”的工作很简单，只是确定一下谁跟主力转移去新的地区，谁留下来。这一工作是由罗荣桓同志负责的。我对他说，你

来分好，你公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几个部门都由你来决定；哪些人走，哪些人留下来，你有决定权，我不争人。罗荣桓同志对我非常支持，他亲自挑选了一些人，留下的同志虽然人数不多，但很得力。司令部留下了李迁赞、刘彬、黄鹏、刘显盲等同志；政治部留下了舒同、王槐、潘自力、余广文、罗文坊等同志；供给部和卫生部留下了查国祯、叶青山、姜齐贤等同志。我对这些同志说，由你们先把各部的架子撑起来。“分家”的时候，总都还没走，我到总部去了一趟，左权同志把总部的副官长唐延杰同志推荐给我。他说，把唐延杰调给你当参谋长好不好？我说，好吧，反正我没有别人，来一个多一个。唐延杰同志我早就认识，他原来是安源煤矿的工人，北伐军打进武昌之后，他拿着湖南省委书记夏曦的信来找我分配工作，我介绍他到叶挺的独立团当兵。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在红二十八军当参谋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他在总部任作战处长，以后又任副官长。唐延杰同我讲，他胜任不了参谋长的职务。我说，你当过军参谋长，怎么干不了？先干起来再说。现在就我们几个人，我还独挡一面呢！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的两个队。还有总部特务团的一个营部带两个连，以及团部的政治处、供给处，肖文玖同志就是随这部分部队留下的。他们由赵尔陆同志负责，在山西、河北交界地区活动。此外，还包括三四三旅派往平山、井陘、平定地区的工作团，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派往平山、孟县地区的工作团，六八五团的一个连和孙毅同志带的随营学校，随营学校底下还有些干部。加在一起，总共约 3000 人，这就是日后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全部基础。这些干部战士来自不同的单位，可以说是“五湖四海”。

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开展工作，这点力量是很单薄的，特别是缺乏干部。刚分家的时候，机关的同志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人有多少，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确实如此，司

令部就那么几个人，政治部、供给部也只有几个人，一个部门有一条炕就可以挤下。留下的部队和干部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红军时期的骨干。我鼓励大家，我们人少，可以慢慢扩大吗！到后来，部队发展得很快，老一点的战士、警卫员、勤务员，许多人成了连长或指导员。

分家以后，一一五师主力南下汾河流域晋南，我和留下的部队隔绝在敌后，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部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

受 命 之 后

晋察冀根据地的开创工作，经过一个艰难的过程。初创时期我们面临的形势，是非常困难的。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晋察冀地区陷于更加混乱的状态。各县的政权机构，实际上都已瓦解。晋东北地区，除五台、盂县两个县政府，分别在宋劭文和胡仁奎领导之下，仍能执行一些政务外，其他各县政府的人员，都已逃散一空。在这个广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那个时候，不少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了，悲观绝望的情绪相当严重。我们经过市镇，市镇是萧条的；走进县城，县城是空荡荡的。城镇上留下的，多是上了岁数的老年人。许多县城都笼罩着死沉沉的气氛，呈现出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实在令人心酸。

当时，正是深秋初冬季节，五台山区已经开始飞雪。而我们的许多指战员还没有棉衣，赤脚上穿的还是草鞋。部队的给养问题，使得负责供给工作的同志很是发愁。没有一定的供给来源，常常是顾得了今天，顾不了明天。

在运输和物资动员方面，更是不易筹措。因为一批又一批败

退的国民党部队，牵走了大批驮骡毛驴，驮着家私和女人后逃。据一天的统计，溃军向五台县要的驮骡总数达六七千头。五台县县长哀叹：“就是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没有办法的。”败退的国民党部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把当地的物资洗劫一空，给我们部队的行动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要打仗，就免不了有伤亡，而受伤的战士，当时既没有后方医院，又没有充分的医药，连棉花绷带都缺乏。许多伤病员，往往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因而延长了治愈的时间。

那时，我们遇到的另一个困难，就是兵力过于单薄。我深知，在偌大一个地区，留下的兵力不过三千人，为了创造根据地，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有更多的武装力量。然而，这些力量从哪里来呢？除了积极发动群众，没有第二条路。但是，群众武装也不能一下子训练成有坚强战斗力的部队。同时，新成立的队伍，普遍缺乏武器，所搜集到的国民党军队遗弃的武器，也多残破不全。

这就是当时我们面临的困难形势。

如何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完成开创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呢？受命之初，我首先考虑的是，必须使每个留下来的同志懂得党中央决策的意义，把党中央放手发动群众，组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图，变为每个指战员的自觉行动。最初，我们住在五台山的庙宇里。尽管山峦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同志们手脚冻裂，但是，大家仍然热烈地讨论着这个问题。

当时我对同志们说，所有留下的同志，应该深刻认识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只有这样，才能对坚持敌后斗争有必胜的信心。

关于必要性的问题，我对同志讲，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条铁路之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地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就会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

的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它可以拖住敌人，给以致命的打击，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它可以打击和摧毁汉奸组织，使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它也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它不仅今天配合全国军民进行战斗，以钳制日本侵略军的进攻，而且在将来会成为反攻敌人的最前线的有力阵地。我谈到，如果不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拖住日本侵略军，而像国民党军队那样，一触即溃，让日军长驱直入，敌人可以轻易地从北平进取武汉。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非常必要的，同志们比较容易地理解了这一点。

最困难的是要解决能不能建成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我对同志们说，摆在面前的困难是巨大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自己，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在具体行动方面，我们要在靠近铁路、公路的地方，先开展工作，也就是北向平绥路，东向平汉路，南向正太路沿线发展。对刚收复的涞源、蔚县、繁峙、广灵、灵丘、曲阳、定县、唐县等地，更要积极宣传抗日，组织群众，做好抗击日本侵略军来犯的准备。所到之处，要积极收集散在民间的武装弹药，按政策筹集粮饷，以利独立自主地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在作战方法上，要善于多打小胜仗，积小胜为大胜，一般不能和日军硬打硬拚。日军侵占一个地方后，我们不能正面进攻它，但可以扰乱它，它总要出来活动吧，我们可以伏击它，打它个措手不及。我还对同志们强调说，创造根据地，绝不能单从地形上看问题。晋察冀地区虽然大山连绵，地形险峻，这是创建根据地的一个条件，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人民群众。所以，在最初举行的几次干部会上，我反复说明，创建根据地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民群众支持我们。我对同志们讲，在晋察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比我们在内战时期建立根据地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战争

的性质变了，社会基础要比那时广泛得多。只要不是汉奸，谁也不愿做亡国奴，我们高高举起抗日这面大旗，人民群众会踊跃地聚拢在这面大旗之下。当然喽，能不能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还取决于我们执行一套什么样的政策。战争性质变了，社会基础变了，我们的政策也必须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第一步，首先是要在各地贯彻统一战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政策，群众就一定能够发动起来。所以，如果我们只从兵力和装备上看问题，就看不出前途来。敌人经过多年的准备，来势汹汹，枪多弹足，这一点，它占着绝对的优势。我们被隔绝在敌后，人少弹缺，不能与之相比。但从全面看，我们比敌人强，而且会越来越强。

同志们有了这样的认识，对创建根据地的可能性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

中央决定我留在晋察冀，一开始，在执行政策问题上，我就注意到接受内战时期“左”倾错误的教训，尽量把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广泛地团结起来。只要你赞同抗日，支持抗日，我们就团结，就欢迎。由于我们执行中央的正确政策，所以到后来，不论我们走到哪个地方，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拥护。抗日战争期间，我住在冀西山区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只带一个警卫员，从这里到那里，安全得很。在创建抗日根据地问题上，晋察冀地区建党比较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地方曾经举行过农民起义，革命的火种一直没有熄灭，这些，也是有利条件。

在被隔绝的敌后建立一个抗日的堡垒，我对面临的困难是有足够估计的。太原失守后，黄敬、邓拓这些年轻同志来到五台山山区的时候，我同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我说，欢迎你们来，但是，你们必须准备吃苦，准备长期地、艰苦地进行游击战争。因为我们是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四面八方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必然会被敌人所利用。我们搅得敌人不得安宁，敌人也决不会放过我们，要准备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这就是我所说的，在晋察

冀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巨性。

受命之后，在五台山区这一阶段的反复讨论和思考，使我和同志们鼓起了斗争的勇气，树立了胜利的信心。大家都做了艰苦奋斗的准备，即使是新来的年轻同志，也都表现很好。像邓拓同志就对我说，他们来晋察冀以前，曾经尝了十多种野菜，就是准备来吃苦的。看到年轻人这种精神，很令人鼓舞。经过战火磨炼，后来他们大多担任了负责工作，为抗日作出了可贵贡献。

自从我二十年代投身革命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党中央身边工作，可以经常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现在，自己带领一批同志留在了被隔绝的敌后，而负责开辟的这块根据地又是这样靠近敌人的心脏地区，必须多思考，反复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谨慎从事。我在五台山时，曾写下这样一个题词：“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这不单是我对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们的勉励，也是我自己下的决心。

从五台到阜平

太原失守后，日本侵略军占据了正太路 and 同蒲路，阎锡山撤至晋西，后来又撤过黄河，到了宜川。至此，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完全被分隔在敌后，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11月7日，即太原失守的前一天，党中央指示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我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同志为参谋长，舒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查国桢同志为供给部长，叶青山同志为卫生部长。军区成立的时候，在五台山石咀普济寺开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太原虽然陷落了，但是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消息，还是传遍了华北四方。那几天，冀中、冀西、察南、平西和晋东北的不少抗日武装和抗日组织纷纷来函，表示庆祝和支持。

晋察冀军区成立之后，部队仍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那些寺